

History of Chinese
Overglaze Decorated
Porcelain

中国釉上彩瓷史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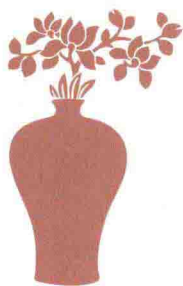
江建新 / 著



History of Chinese
Overglaze Decorated
Porcelain

中国釉上彩瓷史略

江建新 著
Jiang Jianxin



书籍设计 特木热
摄影 邬书荣
万淑芳
责任印制 梁秋卉
责任编辑 张小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釉上彩瓷史略 / 江建新著. —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010-4393-4

I. ①中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釉上彩—瓷器 (考古)
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K876.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3815号

中国釉上彩瓷史略

江建新 著

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

<http://www.wenwu.com>

E-mail: web@wenwu.com

北京金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787×1092 1/16 印张: 5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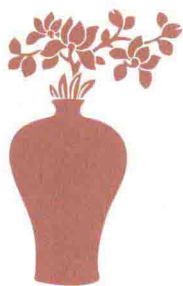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010-4393-4

定价: 60元

History of Chinese
Overglaze Decorated
Porcelain

中国釉上彩瓷史略

江建新 著
Jiang Jianxin



 文物出版社

书籍设计 特木热
摄影 邬书荣
万淑芳
责任印制 梁秋卉
责任编辑 张小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釉上彩瓷史略 / 江建新著. —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010-4393-4

I. ①中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釉上彩—瓷器 (考古)
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K876.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3815号

中国釉上彩瓷史略

江建新 著

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

<http://www.wenwu.com>

E-mail: web@wenwu.com

北京金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787×1092 1/16 印张: 5.5

ISBN 978-7-5010-4393-4

定价: 60元



第一章 绪言

我国的陶瓷彩绘历史源远流长，早在新石器时代，生活在黄河、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已开始使用天然矿物（如赭石等）色涂料装饰陶器^[1]。而随着时代发展，先民们的生存形式和审美意识的变化，并随着这种变化所达到的工艺要求，其装饰的形式和风格也不断变化。今天我们若从那些流传至今的遗物所具有的时代与工艺特征来区分，我国陶瓷彩绘史上曾出现过：先秦至汉代主要采用矿物质涂料装饰的彩陶；三国东吴时代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青瓷；晋代青釉褐斑彩瓷；隋代釉下黑彩瓷；唐代以长沙窑为代表的采用氧化铁、铜为着色剂的釉下褐、绿彩青瓷；唐代三彩陶器；宋、金时代磁州窑为代表的釉下白地黑花彩瓷和釉上红绿彩瓷等。可见，从我国最早的彩陶至釉上彩瓷的出现，时间跨度有数千年之久，其工艺演进十分缓慢，品种也很单调。然而，釉上彩瓷出现之后，情况便不同了，几百年间，我国彩瓷技术便得到飞速的发展，如宋定窑釉上红彩和金彩，金磁州窑釉上红绿彩瓷，元景德镇釉上红绿彩和金彩，明官窑洪武釉上红彩，永乐矾红填绿彩，宣德青花填黄、填红与斗彩，成化青花双勾廊填斗彩，嘉靖采用黑彩替代青花勾线的所谓“大明五彩”^[2]，清康熙硬彩以及引进国外颜料（主要加砷、硼元素）烧制的珐琅彩、粉彩，清末出现的浅绛彩，民国新彩等等，可谓品种繁多、万紫千红。

[1] 详李国桢、郭演仪《中国名瓷工艺基础》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88年，43页。按：彩绘装饰的原料多用天然的赭石、红土或锰土。有的器物表面也涂红色或白色的陶衣，有的彩绘是画在已经磨光的干陶坯上，然后入窑烧成；有的是在陶器烧好以

后才涂绘上花纹。

[2] 清·佚名《南窑笔记》谓：“其五彩，则素瓷纯用彩料画填出者是也。”嘉靖出现釉上黑彩，并有纯用釉上红、绿、黄、黑彩绘画的瓷器，此即所谓大明五彩瓷。



从上述可知，宋、金时代釉上红绿彩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，为中国彩瓷技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。而到宣德斗彩的烧制成功，则标志着这一彩饰工艺的成熟。其成熟的彩饰工艺为明以后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，它不仅对我国陶瓷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，而且对邻国十五世纪安南（越南）陶瓷和十七世纪有田（日本）陶瓷也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清康熙乾隆时期的釉上彩是中国彩瓷发展的顶峰，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在继承前代基础上有所创新。因此对宋金时代至民国时期釉上彩作一考察，这不仅对研究中国彩瓷发展史，就是对整个中国陶瓷工艺、科技和文化艺术史的研究也都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。



第二章 关于最早的釉上彩瓷器

我国十四世纪前没有记载有关釉上彩之类的文献，直到洪武二十一年（公元1388）曹昭《格古要论》中才有片言只语的相关文字^[3]。因此，要研究早期釉上彩瓷便只能借助于实物资料了。以现今的公私收藏和公开发表的资料来看，我国最早的釉上彩瓷有以下两类：一为定窑系釉上彩；一为磁州窑系釉上彩。前者有上海博物馆藏定窑白瓷刻花红彩碗（图1）（内壁饰红彩书“长寿酒”铭）^[4]与传世和出土的几件白釉、蓝釉、黑釉金彩及紫定金彩器等^[5]；后者则有大量传世与出土的红绿彩瓷。从现今考古资料来看，前者遗物在窑址中尚未发现，而后者则在河南、河北、山东和山西地区的磁州窑系20多个窑址中有发现^[6]。鉴于定窑釉上彩遗物稀少，且彩饰工艺和烧造年代与磁州窑产品大体相同。因此，笔者在下文将着重介绍和讨论磁州窑红绿彩瓷。

图1
定窑刻花“长寿酒”铭碗
上海博物馆藏



[3] 明·曹昭《格古要论》卷之七“古饶器”条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子部一七七杂家类，总第八十一册，而200。

[4] 《中国陶瓷·定窑》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83年，图版75。

[5] 泮（日）小学馆《世界陶磁全集·12·宋》，1977年，图版15、17；袁南征《合肥出土紫定金彩瓶》，《文物》1988年第6期，86-87页；东京国立博物馆《特别展·中国的陶磁》，平成六年，图片154、157、158。

[6] 秦大树、马忠理《论红绿彩瓷器》，《文物》1997年第10期，55页。



图 2

磁州窑红绿彩牡丹纹碗
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



图 3

磁州窑红绿彩芦雁衔枝纹碗
日本安宅公司藏

从目前国内外见诸公开的收藏来看，磁州窑系红绿彩总数有百余件，而近年在旧城改造基建工地采集到的红绿彩标本总计约 2 万件^[7]。兹举几例馆藏有代表性的介绍如下：

1. 红绿彩牡丹纹碗，高 4 厘米，足径 6 厘米，口径 15.5 厘米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^[8]。（图 2）

2. 红绿彩芦雁衔枝纹碗，高 4 厘米，口径 15.2 厘米。日本安宅公司收藏（图 3）^[9]。

[7]按：日本收藏有 50 件左右，参见长谷部·乐尔著《五彩水禽文碗 为宋赤绘》，东京国立博物馆志，一九七四年六月号。美国收藏十几件，参看 Yutaka Mino, “Freedom of clay and Brush through Seven centuries

in Northern China; Tz. u-chou Type wares, 960-1600 A.D.”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81, Bloomington. 又据报道，我国邯郸市峰峰区以及河南、山西等地又出土有几十件，英、法等国博物馆亦有收藏。

国内外收藏总计百余件。据望野《河南中部地区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彩绘陶瓷》（《文物》2006 年第 2 期）文载，近年采集的标本总计约两万件，其中完整或较完整的器物 100 余件。

[8]（日）小学馆编《世界陶磁全集·13. 宋金元》，1981 年，图版 20。

[9]同注（6），版图 21。

3. 红绿彩水禽纹碗，口径 17.3 厘米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（图 4）^[10]。
4. 红绿彩荷花纹碗，口径 16.8 厘米。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（图 5）^[11]。
5. 红绿彩鱼纹碗，口径 16.8 厘米。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收藏（图 6）^[12]。
6. 红绿彩牡丹纹罐，高 10.5 厘米。日本大和文华馆收藏（图 7）^[13]。
7. 红绿彩牡丹纹高足杯，口径 8.9 厘米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（图 8）^[14]。
8. 红绿彩花卉纹粉盒，直径 10 厘米。香港关善明收藏（图 9）^[15]。
9. 红绿彩孩子枕，高 15.4 厘米。香港关善明收藏（图 10）^[16]。
10. 红绿彩文臣俑，高 32 厘米。台湾鸿禧美术馆收藏（图 11）^[17]。
11. 红绿彩莲荷纹玉壶春瓶，高 30.4 厘米。美国印地安纳鸿利斯美术馆和深圳望野博物馆有收藏（图 12）^[18]。



图 4
磁州窑红绿彩水禽纹碗
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



图 5
磁州窑红绿彩荷花纹碗
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



图 6
磁州窑红绿彩鱼纹碗
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藏

[10] 东京国立博物馆《特别展·中国的陶磁》，平成六年，图版 216。

[11] "Masterpieces of Chinese Art from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",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, Osaka, 1989, Osaka P1-79.

[12] (日) 佐藤雅彦《中国陶瓷史》昭和 53 年 3 月 27 日初版，平凡社发行，图 168。

[13] 同注(6)，图版 270。

[14] 东京国立博物馆《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·中国陶瓷篇 I》，东京美术，

1988 年，图版 602。

[15] 香港艺术馆《关氏所藏宋代陶瓷》，1994 年，图版 161。

[16] 同注(13)，图版 160。

[17] 鸿禧美术馆《中国历代陶瓷选集》，1990 年，台湾，图版 5。

[18] Yutaka Mino, "Freedom of clay and Brush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in Northern China: Lu-chou Type wares 960-1600 A.D."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, Bloomington P1.105; 深圳博物馆等《精彩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9 年，版图 80。



7	8
9	11 12
10	

图7
磁州窑红绿彩牡丹纹罐
日本大和文华馆藏

图8
磁州窑红绿彩牡丹纹高足杯
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

图9
红绿彩花卉纹粉盒
香港关善明藏

图10
红绿彩孩子枕
香港关善明藏

图11
红绿彩文臣俑
台湾鸿禧美术馆收藏

图12
红绿彩莲荷纹玉壶春瓶
深圳望野博物馆收藏



以上例 1-5，其纹饰均绘于碗心及内壁的白釉之上，外壁素白无纹，形制基本一致。其纹饰均采用矾红勾描出图案，以绿、黄色饰地或摺抹、廊填花瓣、草、叶之类。其中例 1、2 器足底均有墨书“泰和元年二月十五日记”铭，这段纪年文字是目前可资判断红绿彩烧造年代的唯一根据。例 6，该罐器型为宋流行样式，所绘纹饰彩画风格与上述牡丹纹碗一致。例 7，该杯内壁底心绘折枝牡丹纹，外壁用红、黄线隔框，框内书矾红“天地大吉一日无事深谢”十字，这是仅见的一件釉上两面彩（杯内、外壁）瓷器，其文字装饰当直接受磁州窑铁绘影响，另见有书“招财利市”、“冯”、“大吉”矾红字样的碗^[19]。例 8，口沿与盒面边缘均以黑彩作边饰，盒面黑圈以内以黄彩绘六出花瓣，绿彩绘叶，红彩描枝，该器彩饰手法与上述器物略有不同，即未以红彩勾描图案，为红绿彩中较为稀见的制品。例 9，枕面以白地用红、绿彩绘石榴纹，婴孩眉眼、发髻、衣褶纹以高温黑彩勾绘，其彩饰手法与例 8 相似，当为同一窑口产品，有学者认为是宋山西长治窑烧造的产品^[20]。广州南越王博物馆藏红绿彩鹅纹长方形枕和折枝花卉纹枕^[21]与上述孩子枕彩饰风格相近，似为同一窑口的产品。例 10，其俑衣褶纹用绿彩涂抹，内填红彩，发冠用红、黄、绿三色描绘，眉眼、胡须、座框用黑彩勾画，与该器彩饰风格相近的有日本出光美术馆藏红绿彩婴孩瓷塑^[22]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红绿彩持莲童子^[23]，此类产品见诸报道的还有男女立俑，文殊菩萨（有贴金装饰）、武士俑、小狗等。例 11，腹部以黄色为地饰莲花荷叶纹，花瓣填红彩，叶填绿、黄彩，口颈部施有绿釉，该器造型和装饰手法是红绿彩中仅见的一种，其窑口尚待研究。

[19] yutatka Mino, "Ciahou Type Ware Decorated with Enamel Oergiaze paninting", 《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讨论会》论文, 1983 年, 北京大学。

[21]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、宝法德企业有限公司《枕——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》，1993 年，图版 147、145。

[22] 同注 (12)，图版 128。

[20] 同注 (14)。

[23] 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瓷》，文化出版社、两木出版社，1993 年。



现在仅就纹饰作一考察：

1、牡丹纹

牡丹，本名芍药，唐以前少有人提及，唐·段成式谓“成式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，初不记说牡丹，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”（《酉阳杂俎》卷十九），唐以后才成为观赏植物。唐·刘禹锡《赏牡丹》诗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^[24]，李肇《国史补》谓“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。每春暮，车马若狂，以不就观为耻”；宋代牡丹热不减唐代，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“洛阳之俗，大抵好花，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，虽负担者亦然”，“大抵洛阳人家家有花”，崇赏牡丹成为宋代一种社会风气。

就有关工艺美术品资料来看，唐代金银器以及五代越窑青瓷已出现牡丹纹样，宋代定窑、磁州窑、耀州窑、吉州窑及景德镇窑瓷器上大量流行，宋代建筑物、墓室壁画与丝织品（缣丝）也常见。红绿彩上的牡丹纹非常丰富，从美国克兰夫特、波士顿和日本木菊 粹巧艺美术馆收藏的实物来看，其牡丹姿态就有正视、侧视、仰视之形^[25]。这种生意盎然牡丹纹正是人们赏牡丹风气的反映，而彩绘牡丹纹的红绿彩瓷似乎更受人们的青睐，因为，我们可以从活跃在两宋之交的著名画家李唐的诗^[26]中窥见这种情况：

云里烟村雨里滩，看之容易作之难。

早知不入时人眼，多买胭脂画牡丹。

红绿彩上大红大绿的牡丹不正如画家所言的“胭脂牡丹”吗，而绘有牡丹纹的红绿彩不正入时人眼吗。

[24] 《全唐诗》六函二册，刘禹锡十二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影印本，912页。

[25] 见注(7)；陈昌荣编著《中国陶瓷》宋元瓷器，台湾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，1982年；日本木菊 粹巧艺馆《东洋陶磁

之美》，平成元年9月20日发行。

[26] 清·厉鹗辑《宋诗纪事》卷四十四。李唐题画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1116页。

2、莲荷纹

莲花纹最早见于南朝青瓷上，其纹饰为花瓣形的适合图样，而富有写实和绘画意味的莲花，荷叶纹则出现于晚唐的越窑青瓷^[27]与长沙窑青瓷器上^[28]，但纹样均简化率意。红绿彩上的莲荷纹极为别致。例4所绘大朵盛开的莲花纹构图新颖，其尖圆向上盛开的花瓣与下俯的荷叶，突出了荷花清丽的姿态，这种纹样在宋代耀州窑刻花与磁州窑铁绘瓷器上也常见^[29]，其构图与宋画《出水芙蓉图》^[30]极为相似（图13），可见这类题材是当时流行而又特殊的纹样。宋·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“十里荷花”条载：孙何帅钱塘，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云：“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……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异日图将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”此词

流播，金主亮闻歌，欣然有慕于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，遂起投鞭渡江之志^[31]。

荷艳桂香是江南美景的象征，金主完颜亮是否因垂慕江南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而用兵宋室，我们不能据此而下结论，但我们却能从中看出宋金间世人对荷花赋予的特殊审美寓意，瓷器上流行的荷花纹似与这种寓意有着某种联系。



图 13
宋·出水芙蓉图

[27] 陈万里《越器图录》，上海中华书局发行，1931年，84页。

[28] 周世荣编著《长沙窑瓷绘艺术》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94年。

[29]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《中国古陶瓷展》，1981年，20页。

[30] 王逊《中国美术史》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，408页、241页。

[31] 宋·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卷之一，两编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241页。



3、鸭、芦雁、鱼纹

宋代定窑刻花有双鹅游水纹^[32]，红绿彩上的游水鸭构图与双鹅纹大致相同，水中体态丰腴的鸭与生意盎然的茨菇和浮萍，犹如一幅鸭嬉春水图。这是以往的瓷器上都未见过的纹样，极为特别，使人很自然地将它与宋·苏轼诗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”的意境相联系^[33]。

雁纹，唐代金银器已出现飞雁衔绶为主题的纹样^[34]，北宋定窑印花盘有这类花纹^[35]，红绿彩所绘一展翅衔草雁纹与定窑相像，只是定窑飞雁下饰缠枝卷草纹，而红绿彩飞雁下饰一六出朵花，以后元代青花瓷器上的飞雁纹与红绿彩上的纹样大致相同。

鱼纹，红绿彩上游鱼纹与磁州窑铁绘鱼纹相同，是宋金时代流行的纹样，可能受到宋人词中常出现的“莺啖上林，鱼游春水”诗意的影响。

4、构图与用笔

红绿彩上的牡丹纹、莲荷纹与宋代院画花卉纹构图是相同的，它们大都采取大胆剪裁以突出主体形象的手法，如常见的牡丹纹就是以单独的花朵占据主要空间，辅以少许叶片；莲荷纹也是以单独的花朵占据大部分空间，衬之以荷叶，这与宋画（旧题吴炳作）《出水芙蓉图》的构图几乎如出一辙。尽管红绿彩与国画一样使用毛笔来勾描纹样，看不出有严格规范的所谓“十八描”法，不过运笔中的节奏感和线条的轻重曲直与国画有同工之妙，如红绿彩中常见的鱼藻纹中的带状水草就是以“兰叶描”绘成；莲花瓣就以“柳叶描”绘就；而牡丹花瓣则运用了国画“点垛”法，如例6罐上的

[32] 东京国立博物馆《中国陶瓷展·目录》，1980年，图6。

[33] 详见熊和、蔡义江等《唐宋诗词探胜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，318页。

[34] 韩伟编著《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》，三秦出版社，1989年，线图16。

[35] ミカワ・美术馆《中国美术名品展》，1989年，版图71。